

少年习画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惠孝同。惠孝同先生原名惠均,出生北京。民国时期的画坛“领军人物”金城(北楼)的门徒,1927年加入湖社画会,为骨干之一。湖社成员皆号“湖”字,惠先生号柘湖。陈少梅先生亦曾加入湖社,号升湖。其他成员有陈半丁、于非闇、胡佩衡、王雪涛、溥儒等。惠孝同又是收藏大家,所藏宋元名品知名于世。

我与惠先生家是远亲。每至暑期,就跑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甜水胡同惠先生家,一处深宅大院的一间厢房里。这厢房平时空着。惠先生的书房正对着一个很大的有花有树的庭院,房中一面黑色大漆的木隔扇门窗,其他三面全是顶天立地的楠木书架,放满线装书籍;日照进来,楠木香与书香混在一起,香气沁人,现在任何人的书房都不会再有这种香味了。有时先生上午叫我到他的书房,听他谈书论画,说古评今。他喜欢双手相互搓一搓手掌,待搓热了,再举起手搓脸,他说这样很舒服。这样一点点进入谈兴。说到高兴时,起身去拿来一幅古画,挂在书架上给我看,边看



惠孝同先生

冯骥才

边讲,此时他心里充满欢悦。在他的书房里,我看过他珍藏的宋代王洗的《渔村小雪图》,这幅画堪称国宝;此外还有吕纪的中堂花鸟《四喜图》,饱满丰厚,富丽堂皇。一次,先生拿来一幅二尺余高的小画,放在镜框里,竟是我之最爱——郭熙的《寒林图》。惠先生说,这幅画上无款,不一定是郭熙所作,但确是郭熙风格,并颇具郭熙神韵。郭熙善以云头皴法画窠石,以蟹爪笔画寒林,所作冬景刚劲瘦硬,寒气逼人,技艺之高,直追李成。惠先生说罢,拿给我一张与这幅画大小差不多的素绢,叫我对临。这次对临古人原作的体验,敲骨吸髓般地进入了我的笔管。

我从严六符先生那里学到的是宋代北京的画法,是马夏的斧劈皴、钉头鼠尾皴和刘子久的豆瓣皴;从精通南宗的惠先生这里学到了披麻皴和解索皴,尤其是他擅长的小青

绿的染法。二位老师叫我触摸到宋代山水的整体。

我十九岁那年高中毕业,报考中央美院,顺利通过初试。主考官找我谈话,说中央美院要成立“李可染工作室”,问我是否喜欢李可染先生。我说李可染先生是我尊崇的画家,并说了我对李可染先生的理解!我从主考官那里感到自己很有希望,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主考官微笑着叫我做好去北京中央美院复试的准备。可是此后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音讯,直到知道自己榜上无名。过后才清楚落榜的原因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在那个时代,习画有两种方式,一是求学于美院,毕业后分配到美术专业的单位工作;一是传统的方式,即问道师门,私人传授,这样便很难被体制内的艺术部门认可。惠孝同先生喜欢我,一度想把我调到他就职的北京画院开办的国画学校教课,但由于“文革”的到来而中断。此后,再加上社会的变迁和个人境遇的艰难,与先生渐渐疏离了。

可是,只要拿起笔,还会感到先生的影响。当然这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

五月下旬的北京可以说已经完全进入夏季了,连我这个老年人都戴好口罩,穿上旅游短裤和运动短袖T恤衫外出散步了。我现居京城昌平区龙城花园,小区还真不错,我家小院一棵硕大的杏树经过多年的风霜雨露

和精心的施肥浇水管理,今年从青青的手指盖大到如今的小柴鸡蛋大,不知不觉颜色呈橙黄色,黄杏准时成熟了,树冠上中下和里里外外都挂满了果实,个个都金光闪闪呢!人们称此早熟品种为麦黄杏,多吃杏可以防癌,植物对人类贡献真不小呀!今年我国各产麦大省都喜获丰收,纷纷开镰收割了。说“开镰”,实际上现在我国各地都是清一色的自动联合收割机呢,眼前“龙口夺粮的三夏”抢收又抢种,农家人人奋勇当先争分夺秒啊。当年下乡当了十年知青,虽然在园艺场主栽苹果和葡萄等水果,但也亲临过农场见识金色麦浪起起伏伏,农活也样样都干过呀!

趁麦黄杏新鲜忙提篮给邻居送上。在路上又见各色月季,在路旁和

各家院前争艳怒放;低头见路旁因疫情停工的院子里、小区工地上以及修建的小区中心花园中又别有一番自然景象,颇有催人奋发的气象!工地

向植物学习

万伯翱

因为前两年装修未完,早早地罩上一张张绿色的纤维织网,目的是防扬尘污染空气。但眼前大雨后的景象,使我十分惊讶并由衷肃然起敬:只见单层、双层的密织绿网小小的针眼中竟然冒出了大大小小低低矮矮的绿色植物,它们手拉手、肩并肩终于冲出了“罗网”,齐刷刷地伸长着脖子和手臂向着蓝天白云、向着自由和灿烂无比的阳光,坚强不屈地生长起来了!

定睛观察,有软弱茎叶的草本,应是当年和二年生的野菊类,单层羽状花瓣,花期可长达六七月之久呢!这朵朵小黄花生长在主茎上,分出的侧枝又长出数茎,还带着花骨朵,竟然都钻出网眼外展现眉眼了!还有同样软叶软茎的“灰灰菜”,大大的绿叶挣脱这铺天盖地的网,获得了自由自在生长

日本的毕业季和入学季都是在3月,在樱花开始盛开的季节。硕士毕业的同时,我考入了同校的博士课程。对我来说,真正的离别是2019年的3月,最终决定结束博士课程的学习,回到已经7年多未真正回去过的家乡。毕业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乡远行的终结。将近7年半的异国生活,回首时总觉得有一丝不可思议。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南京,没有离开过家。起初对于能否一个人应对异国的生活和学习,都没有怎么深思便启程了。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也许在日本的这段留学生活最终让我真正找到了自己。

走出舒适圈,是近几年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出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那种没有退路的走出舒适圈的方式吧。毕业后工作了三年,其间自学日语,在同龄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逐渐走向稳定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

当然,最初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完全沉浸在另一个国家的文化中是留学生活最吸引人的部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遇见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自己,外国人以及学生这两重身份的叠加,造就了一种非常特殊



任溶溶先生是我老友、老同事。今年正当他百岁大庆,这是我国文坛、特别是儿童文学界值得庆贺的喜事。许多文章纷纷见诸报刊和网络,我也提起这闲置已久的秃笔,写下一点小事,作为祝贺。

我说是他的“校友”,他可能会觉得惊讶:哪来这样一位同学呀?回忆他读过的小学、雷士德附中、大夏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样一个家伙的人影。这可能会让他觉得我“没头脑”,惹得他“不高兴”了。如果说,我们可是“五七干校”的老校友啊。他应该会莞尔一笑,恍然大悟。1968年,上海新闻出版系统四五百人,浩浩荡荡开拔到奉贤滩涂,在海边盐碱荒地上建起“五七干校”。任溶溶属于少年儿童出版社,相当于副总编辑的领导,却分配到养猪场当猪倌。我属于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分配到连队工具间管理铁镢、锄头、扁担等农具。干校占地很大,一望无边。土路纵横,“营房”无数。除了开全校大会,很少有机会与他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权威”任溶溶。后来知道他一边喂猪,一边“本性不改”,偷偷地自学意大利语。古有“对牛弹琴”,今有“对猪学洋文”,真是文坛佳话。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任先生竟然不释卷,这种精神真令我佩服万分。

再说说他和我“同事”,这倒货真价实。干校后期,陆续抽调学员回市区工作,记得有“四个面向”的安排,也有人留校做“老山东”(即待了三个冬季)。任溶溶调往干校的“翻译连”,和草婴等几个翻译家翻译《苏共党史》《沙俄侵华史》等“内部书刊”。不久,就调回人民出版

的权利,竟连成了一大片!还有大江南北最常见的高大乔木:榆、柳、桑、槐、楝等小树苗,也挣破这紧张箍大网挤出了头,露出了自己的嫩叶小枝了!更有不少我叫不出名字的杂草,也都吹响了“集结号”——萌发出尖尖的各种形状深浅不同的绿色小叶,也重见天日了!

眼前蓬勃的绿色景象,让当年青丝满头的园艺工艺、如今白发耄耋的我久久感叹人生:人竟然不如野草、杂树、野花呀,它们沉默不语向上奋斗,争取再生的能力,不顾生存条件多么恶劣,迎着灿烂阳光和甘露惠风就能成活,这种乐天派态度,顽强不屈、永远求生、永远向上的高尚品质,尊贵的人类难道不能屈尊向植物好好学习、受其启发而善待它们吗?

社编译室。我则在一个冬天后,被调往上海燎原化工厂仓库,做修旧利废的劳动。在这里认识电影厂演员李明、编剧沈寂等多位名人。几年后,我也调回人民出版社(当时全市合并成这一家独大的出版社),在综合部资料室当了图书管理员,主要是整理外文图书资料。室主任是另一位儿童文学家周大康,即圣野先生,他如今也已年过百岁了。

1978年1月,在外国文学编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我俩都得以划归该社。他编辑新创刊的《外国文艺》和《外国故事》,后来成了副总编辑,我的顶头上司。人生聚散皆有缘。原来任溶溶先生和我“来自五湖四海”,却意想不到成为同事。当时,译文出版社在延安中路铜仁路口的一个弄堂里,是一幢花园小洋房。因办公房有限,资料室只能放在伙房楼上的二层阁和三层阁,我的办公桌只能放在二楼室外楼梯口,谁要去三楼藏书室,必定经过我的办公桌前。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常到我这个守在资料室门外的“门外汉”这里来的,就是任溶溶先生。资料室对图书管得很严,除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许多书不能外借。任溶溶好学不倦,嗜书如命。他时常到三楼,在浏览之外,借些日文书籍。他当时跟着电台学日文,对日本文学很感兴趣。我从来没有掌过什么权,想不到书籍出借的“大权”在握,便当起了好好先生。任溶溶要借多少书,我都网开一面。多少年后,他一直记得这件事。

任溶溶成为儿童文学翻译大家,绝非偶然。他掌握英、俄、意、日等多种外语,翻译和创作了近千万字的作品,真是高山仰止,令我望尘莫及,当然更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的秘密,不要告诉别人 (油画) 黄石

止时间追赶的夜晚;认识新的朋友,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课题、研究方向、他们的梦想;每一次成功,每一次失败……回首留学时光,每一天、每一秒都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敬佩那些坚持学术理想的朋友,因为我知道这条道路多么地孤独和艰难。虽然我选择了回国开始新的生活,但也正是因为在这里学习获得的知识 and 勇气,才让我认识到自己擅长、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

人们常说学院是象牙塔,这个说法在学术研究方面不无正确,因为象牙塔是培养科研精神的必需条件。这段学习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它让我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且幸运的是,毕业时有盛开的樱花给我送行。

十日谈

那年,我毕业了

责编:郭影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请看明日本栏。

